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刘师培 著 刘跃进 讲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刘师培 著 刘跃进 讲评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 刘师培著；刘跃进讲评.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506-0079-9

I. ①中… II. ①刘… ②刘… III. ①文学史—中国—汉代～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7591号

- 书 名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著 者 刘师培 著 刘跃进 讲评
责任编辑 李相东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无锡市证券印刷有限公司
无锡市扬名高新技术产业园B区75号 邮编:214024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242 千字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079-9
定 价 30.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0—85435666)



刘师培及其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引论

刘跃进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是近代著名学者刘师培临终前一年刊布的一部有关汉魏六朝文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影响颇巨。另其《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与《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因与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密切相关,这里一并提供给广大读者作为参考。

—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号左龢,江苏扬州仪征人,出身于世代书香门第。他的曾祖刘文淇字孟瞻,祖父刘毓崧字伯山,叔父刘寿曾字恭甫,均以治《左传》享盛名于道、咸、同、光四朝,列《清史稿·儒林传》。母亲李汝谖,为江都小学家李祖望之女,通晓经史。而仪征刘家所生活的扬州地区,更是人才荟萃,学人辈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焦循的专精之学自不必说,主持刊刻《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的阮元,也曾与《四库全书》总纂纪昀齐名,世称“两文达”(阮元、纪昀并谥号文达)。在这样一个富有浓郁学术氛围中长大的刘师培,濡染熏陶,自幼就熟读经典,出入子史,研习诗赋,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称之曰仪征刘氏家学乃至扬州学派的“殿军”,似不为过。

从现存资料看,刘师培二十岁公开发表第一篇文章,时在1903年的春天。



上一年,他得中举人,这年赴开封参加会试。临行前,作《留别扬州人士书》,刊发在《苏报》上,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这次会试,刘师培名落孙山,从此他对科场心灰意冷。从开封回到扬州的途中,他滞留上海,与年长他十五岁的章太炎(1869—1936)见面,这对他的思想与学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刘师培对革命产生好感,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甚至更名“光汉”,都应与章太炎的影响有关。两人在学术理念与治学领域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遂成莫逆之交^①。这是刘师培步入社会,成为激进的革命党人的开端。

在章太炎的影响下,刘师培参与了《国粹学报》、《俄事警闻》以及翌年扩版的《警钟日报》的编辑工作,并在两报上发表 40 余种诗文^②。其间,曾续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而作《中国民约精义》、《中国民族志》等,倡言平等之说,辨析夷夏之别;承王夫之《黄书》而作《攘书》,排满复汉。值此时代思潮澎湃之际,他又加入中国教育学会、国学保存会等进步组织,成为职业革命者。

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紧张,刘师培夫妇应章太炎等邀请,东渡日本,就章太炎主编的《民报》作编辑,并加入孙中山创立的同盟会,参与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工作。这期间,刘师培还与张继设立“社会主义讲习会”,与妻子何震发起成立“女子复权会”,创办《天义报》和《衡报》,宣传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理论,提倡废除等级制度,实现人权平等,推行无政府主义。在学术方面,他在日本结识了章、黄学派的重要人物黄侃(1886—1935)。两人年龄相仿,但黄侃对于刘师培的经学颇为钦佩,后来遂北面执弟子礼^③。

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很多知识分子出

① 参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 162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时年章太炎 36 岁。

② 参见陈奇主编《〈俄事警闻〉〈警钟日报〉篇目目录》,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③ 参见黄焯《记先父季刚先生师事徐杭仪征两先生事》,载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第 122 页,三联书店 2006 年版。丁惟汾《刘申叔先生遗书序》称:“近数十年来,学者根底不及前人而求功则欲驾乎其上的。于是挟私见矜异闻,附会穿凿,莫可究诘。其笃守家法,敦古不疑,岿然作清儒后劲者,惟徐杭章太炎、蕲春黄季刚与申叔数人而已。而覃思冥悟,以申叔为最。自季刚以下皆尊师之。”《刘师培全集》第一册第 24 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年版。



于不同的目的,积极投身革命,至少同情革命。业师姜亮夫先生曾对我说过,他的老师王国维(1877—1927)当年也曾通读过《资本论》,可惜我还没有看到相关文字资料。但刘师培确确实实曾组织翻译过《共产党宣言》和克鲁鲍特金的《面包掠夺》、《总同盟罢工》等,思想颇为激进。在倡导革命的过程中,刘师培与章太炎相互钦佩,相互支持。刘师培字申叔,章太炎字枚叔,当时乃至“二叔”并称,可见关系之密切。可惜好景不长,1908年,刘师培与章太炎发生争执,乃至结怨^①。他只好从日本回到上海。

他的朋友们没有想到,刘师培的思想由此发生根本性蜕变,与他先前所积极倡导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渐行渐远^②。他公开投靠了清廷两江总督端方(1861—1911)^③,甚至还把江浙革命党人谋划起义计划秘密呈报^④。而后,他把自己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发表文章也不再用笔名刘光汉,而是多用本名刘师培。他为端方考订金石^⑤,又拜徐绍桢(1861—1936)为师^⑥,研究天文学。这一切都发生在1909年的初春,当时,刘师培二十六岁。

① 关于结怨的内情,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第263页多所披露。中华书局1979年版。汤志钧《读〈量守遗文合钞〉——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卞孝萱《读〈黄侃日记〉》对刘氏变节及与章氏交恶的背景也有论析,见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第177、276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② 蜕变的原因,当时人多归之于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如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就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执君为端方用”,意谓何震暗中接洽清朝封疆大吏端方。《刘师培全集》第17页。

③ 端方,清末大臣,金石学家。满洲正白旗人,本汉人,姓陶,号陶斋。1882年中举人,曾任直隶霸昌道。不久清廷在北京创办农工商局,将其召还主持局务。端方趁此机会上《劝善歌》,受到慈禧赏识,被赐三品顶戴。后调任河南布政使,旋升任湖北巡抚。其后,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闽浙总督等封疆大吏。1911年,四川新军哗变,端方被杀。端方曾出国考察,作《欧美政治要义》,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为中国立宪运动重要著作。他也曾鼓励学子出洋留学,被誉为开明人士。好金石学,著有《陶斋吉金录》。

④ 参见李帆《刘师培与中西学术》所附《刘师培学谱简编》第246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⑤ 根据杨世灿《杨守敬学术年谱》记载,这一年,杨守敬亦受邀为端方考订金石,撰写题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3页。李详亦有《分撰陶斋藏石记释文自定本》,载《李审言文集》第1447页。

⑥ 徐绍桢,字固卿,广东番禺人。父亲徐子退,曾参两广总督节署幕,著有《通介堂总说》、《乐律考》、《说文笺注》等。徐绍桢幼承家学,刻苦勤读,通汉宋儒学,尤究心于军事学,精研熟记近代新战术及各国军制、军事、兵器。清政府在全国编练新军,徐绍桢奉命赴日本考察军事。1904年徐调任两江总督。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被推为江浙联军总司令。1936年9月13日在上海逝世。



此后几年,端方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刘师培随之北上,结识了严复(1854—1921)、罗振玉(1866—1940)等著名学者。后又随端方南下四川。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杀,刘师培落拓无依,投靠成都老友谢无量(1884—1964)。当时,谢任成都国学院院长,乃聘刘师培任副院长,兼四川国学学校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与谢无量、廖平(1852—1932)、吴虞(1874—1939)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编《国学杂志》^①。从学术上来说,这个时期他进入了比较成熟的阶段,而在政治上却在依然随波逐流。他北上山西,投靠阎锡山,任高等顾问。又由阎锡山推荐给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倒也非常器重刘师培,授予参议院参政,封为上大夫。其间,他还与杨度、严复等发起成立筹安会,刘师培就任理事,公开发表《君政复古论》、《联邦驳议》等文,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说明他不仅没有沉浸书斋,忘却世事,而是变其本而加其厉,逐其功而争其名。洪宪帝制失败后,刘师培再次落寞,流落天津,与前清遗老遗少为伍。从1909年脱离革命到1916年袁世凯死后落拓无依,这是刘师培最为时人诟病的八年。

由此来看,在政治上,从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到走向革命的对立面,刘师培确实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人物。同样,他在学术上也充满矛盾:他的很多思想非常超前,每每突破藩篱,令人惊听回视,譬如,他很早就主张白话,甚至要废除汉语,走拼音化道路;同时,他的论著又常常表现出一种浓郁的厚古薄今的倾向。

就在袁世凯称帝失败的1916年底,蔡元培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刘师培得到陈独秀的推荐,得以进入北京大学,其学术生涯也步入最后的辉煌。在北大两年多时间里,刘师培讲授中古文学史;同时,还在国文研究所担任四个方向的研究科目,即经学、史传、中世文学

^① 根据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六译先生年谱校说》,骆凤文校著,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载,刘师培入蜀与廖平等见面在1911年冬。廖平60岁,刘师培28岁。



史、诸子,并在北京大学附设的国史编纂处任编纂员。又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就在刘师培病逝的那年三月,《公言报》刊发一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认为北大陈独秀、胡适等为“新派”,创办有《新潮》杂志。而黄侃、刘师培、马叙伦等为“旧派”,阵地就是《国故》月刊。几天以后,《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刘师培致公言报函》,认为此说“多与事实不符”。刘师培并不承认自己是旧派,更不愿意结帮拉派。他曾向往革命,更眷恋于学问。作为一介文人,刘师培可能更适宜于作学问,但是他的思想又是那样的激进,让他躲进书斋,不问世事,可能很难;而要让他完全理解世态,从容驾驭人情,一定更难。可以说,他的政治理想,他的学术追求,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激进弘通,又保守拘狭。这里可能有性格方面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是那个天翻地覆的时代留给一个知识分子的困惑与无奈。

刘师培死后,他的著述,由弟子陈钟凡、刘文典等人搜辑,友人钱玄同整理,南桂馨校刻而成《刘申叔遗书》74种,总计约四百万字。全书发凡起例于1934年,两年后刻印而成,钱玄同曾就全书的编辑作了详细说明,并附有《左盦年表》、《左盦著述系年》。然全书正式发行,已是刘师培离开这个世界整整二十年后的1939年了。这是刘师培全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系统的整理。此后有过两次补遗,一是罗常培先生根据听课笔记整理的《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①、《〈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即《颂赞篇》和《诔碑篇》的讲录)^②。二是万仕国在罗常培辑本基础上又广事搜罗,编辑而成《刘申叔遗书补遗》,收录五百余篇,总计达一百六十万余字^③。

① 刘师培《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罗常培整理,重庆独立出版社1945年版。

② 刘师培《〈文心雕龙〉讲录二种》,罗常培整理,以“左盦文论”为总题刊于1940年创刊的《国文月刊》第九、十、三十六期。

③ 《刘申叔遗书补遗》,万仕国辑补,广陵书社2008年版。



刘师培二十岁公开发表文字,到他三十六岁辞逝,前后不过十六七年的时间,却写作了五百六十馀万字的作品,平均每年完成约三十五万字的写作量。仅就数量而言,已经相当惊人。何况,他还奔波南北,从事大量的政治与社会活动。更叫人感到惊叹的是,这些著述,广泛涉猎传统经学、小学、校雠学等方面的内容,微辞奥义,金多发明;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如陈寅恪先生所倡导的“预流”之作,论及现代西洋哲学、政治学、教育学、伦理学(如《伦理教科书》)等,贯通古今,旁及中外。所论多言而有据,迥异乎空疏浅薄之论,置诸近代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多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这样写道:

最近五十馀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在此黎明运动中最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论著述发表之先后次之,为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衡),浏阳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馮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庠(诒让),绍兴蔡君孺民(元培),仪征刘君申叔(光汉),海宁王君静庵(国维),先师吴兴崔公觐甫(适)。此十二人,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探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剧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虽趋向有殊,持论多异,有壹志于学术之研究者,亦有怀抱经世之志愿而兼从事于政治之活动者,然皆能发舒心得,故创获极多。



此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此黎明运动中之刘君,家传朴学,奕世载德,蕴蓄既富,思力又锐,在上列十二人中,年齿最稚。……刘君著述之时间,凡十七年。始民元前九年癸卯,迄民元八年己未(1903—1919)。因前后见解之不同,可别为二期:癸卯至戊申(1903—1908)凡六年,为前期;己酉至己未(1909—1919)凡十一年,为后期。相较言之,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刘君著述所及,方面甚多,余所能言且认为最精要者有四事:一为论古今学术思想,二为论小学,三为论经学,四为校释群书。^①

钱氏所列十二位学人,即康有为、宋衡(即宋恕)、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刘师培、王国维、崔适等,是否都足以担当清末民初的学界领袖,或有可商。但是最年轻的刘师培进入当时最杰出的学者行列,似向无异议。

按照钱玄同的分类,刘师培著作有四类最为精要:

(一) 论古今学术思想

《国学发微》,与章学诚《文史通义》相近,又可与章太炎《国学概论》参互对读,可以明了当时所谓国学,实即传统的经史子集之学。最可注意者,是刘师培用了相当的篇幅论述中国佛、道两派之学术,为当时及后来论国学者多所不及。《周末学术史序》,实际上是以序的形式,综合论述周秦之际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财政学、兵学、教育学、哲学、术数学、文字学、法律学、文章学等学科,不啻为一部周秦学术简史。《两汉学术发微论》则分政治学、种族学、伦理学三类讨论两汉学术问题。《汉宋学术异同论》分义

^① 《刘师培全集》第一册第27页,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理学、章句学、象术学、小学等四类辨析汉宋学术异同。《南北学派不同论》分诸子学、经学、理学、考证学、文学等五个方面辨析南北学风的差异，可谓纵览古今，通观万象。《古政原论》与《古政原始论》主要考察古代阶级制度、礼俗、官职、兵制、刑法、学校、商业、工艺、国土、宗法、古乐等方面的成就与阙失。

（二）论小学

主要见于《左龠外集》以及《毛诗词例举要》、《荀子词例举要》、《古书疑义举例补》、《小学发微》、《尔雅虫名今释》、《理学字义通释》等文。特别应叙及的是《理学字义通释》，博涉理、性、情、志、意、欲、命、心、思、德、义、恭、敬、才、道、静等常用的理学概念，疏通字意，阐发义理，颇近于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既是文字学论著，也是哲学著作。至于文字学综合性的著作，当推《中国文学教科书》。此书名曰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中国文字学方面的概论性著作，内容极其丰富。

（三）论经学

刘师培长于经学，向为时人所重。著名学者黄侃仅比刘师培小两岁，却甘拜为师，他说：“余于经学，得之刘先生者为多。”^①经学中，尤以四世家传之《左传》学最称博洽，其次是“三礼”之学。所以黄侃在《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中明言道：“君之绝业，《春秋》《周礼》。”

《春秋》及“三传”中，关于《春秋左传》的研究最为精深，著有《春秋古经笺》、《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微》、《春秋左氏传传例解略》、《春秋左氏传传注例略》、《读左劄记》、《司马迁左传义序例》等。

“三礼”中，《周礼古注集疏》为作者精心结撰之著。1936年，陈钟凡《〈周礼古注集疏〉跋》记述刘师培临终前曾在北平家中谈起自己的学问，说自己年

^① 黄焯《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徐杭仪征两先生事》，《量守庐学记》第125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



来“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①。

此外,《尚书源流考》、《毛诗札记》、《礼经旧说》、《逸礼考》、《西汉周官师说考》、《群经大义相通论》以及《经学教科书》等亦可归为经学论著。其中,《群经大义相通论》最具特点。作者梳理丰富资料,比较群经的异同,包括:《公羊传》与《孟子》、《公羊传》与《齐诗》、《毛诗》与《荀子》、《左传》与《荀子》、《穀梁传》与《荀子》、《公羊传》与《荀子》、《周官》与《左传》、《周易》与《周礼》等,他发现,各经之间,多有相通之处。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史研究,往往强调中国古代经学传授中家法与师法的疆界,似乎各家之间,泾渭分明。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作者辑录了各家论《诗》的资料,分门别类,考镜源流,初读起来很是清爽,但是揆诸学术实际,未必就是如此。刘师培的研究告诉我们,早期的经学流传,往往相互取资,弥缝折衷,并非如后来的学术史家们所描述的那样,壁垒森严,阵线分明。

(四) 校释群书

校订群籍,几乎是清代学者用力最深、创获最大的学术工作。受此学风影响,刘师培年轻的时候,就曾校订过《吕氏春秋》等典籍,此后未曾中辍,校释过《周书》、《管子》、《晏子春秋》、《老子》、《庄子》、《墨子》、《荀子》、《新书》、《春秋繁露》、《法言》、《白虎通义》、《楚辞》、《穆天子传》、《韩非子》、《琴操》等古籍。比勘异同,定夺是非,与清代著名校讎学家卢文弨、孙诒让相比,自在伯仲之间。

如果细分,刘师培的研究著作还可将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和文学研究独立开来。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后面还要详谈。这里仅以历史学论著而言,

^① 《刘师培全集》第一册第27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



他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就是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而《中国地理教科书》则是中国地理学方面的通论著述。《古历管窥》则在钱大昕等人基础上，深入讨论天文历法问题，可谓研几抉微。此外，还有大量的读书笔记，如《左龠题跋》为群书叙录，而《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尤其值得注意。

我们知道，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①在1906年至1908年间深入敦煌莫高窟，对全部洞窟编号，并抄录题记、摄制大量壁画照片。1909年，伯希和再到中国采购汉籍，携带了部分敦煌写本精品，出示给中国学者罗振玉、蒋斧、王仁俊、董康、刘师培等人，中国学术界始知有敦煌遗书。根据《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小引知道，该文作于宣统二年(1910)，也就是从伯希和处看到敦煌文献的第二年，刘师培敏锐地发现了这批文献的巨大价值，提纲挈领式地加以介绍。提要包括：《毛诗诂训传·国风》残卷、《左传》杜预集解昭公残卷、《穀梁传》范宁集解残卷、《文选》李注残卷、《文选》白文残卷、《唐地志》残卷、《古类书》残卷、《周易》王弼注残卷、《庄子》郭象注残卷、《春秋穀梁经传解释》残卷、《隶古尚书》孔氏传残卷等。刘师培所生活的扬州地区，历来是《文选》学研究的重镇。刘师培秉承前哲学风，也对《文选》学格外重视。在敦煌文献中，《文选》学资料常常涉及到一些重要的问题，譬如李善注六十卷的分与合，李善注早期版本与后代传本的异与同，还有《文选》白文三十卷等重大学术问题。敦煌本出现，刘师培等早期敦煌学者筚路褴褛，敏锐发掘，这些问题才又重新浮出水面，引起后世的广泛关注。那一年，刘师培才27岁。

从上面介绍可知，刘师培的学术研究有两个非常鲜明的特点：一是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二是对西方文明的吸收。坚守传统文化，即坚持从文字、音

^① 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法国著名汉学家、探险家。1905年由中亚与远东历史、考古、语言及人种学考察国际协会法国分会会长埃米勒·塞纳尔(Emile Sénart)委任为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与测量师路易·瓦扬(Louis Vaillant)和摄影师沙尔勒·努埃特(Charles Nouette)一起，于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西域。



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等传统研究方法入手，整理先秦两汉典籍。而吸收西方文明，主要是指他在西学初渐之际，引领风潮，勇于吸收现代思想精华，善于运用现代学术方法，考镜源流，颇具史家风范。《左龠外集》卷九有《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就是通观中国历史的学术史著作。

《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将世俗民风与学风的变化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学风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世风变化。由此看来，每一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引领世风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譬如两汉崇气节，而三国尚权诈，六朝别流品，隋唐则重功名。这些变化，既与统治集团的政策导向密不可分，更与那个时代的士人追求息息相关。刘师培因此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欲考中国民气之变迁，当先知中国学风之变迁。”^①

学风的变化，对于近代政治文化发展变化的意义，也是刘师培时常关注的问题。其《清儒得失论》纵论清代学者各家之得失，而《近代汉学变迁论》又将讨论的范围缩小到当时颇负盛名的“汉学”上，指陈利弊，颇中肯綮。作者将清代汉学发展分为四期。顺康时期的阎若璩、胡渭等为“怀疑派”代表，他们治学的范围非常宽广，对于前代学说，多所怀疑，由思而学，援据精博。康熙乾隆时期的戴震、钱大昕等为“征实派”，好学深思，多闻阙疑。这两派的中坚多是清代学术领域的实力派人物，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竖立了较高的学术标的。他们的追随者高山仰止，只能肆力于群籍的校勘，旁搜博采，摭拾旧闻。刘师培视之为“丛缀派”。尽管规模较小，不成气象，但终究还是在学问之间讨生活。而嘉、道之际，随着政治形势的巨大变化，今文经学振臂而起，常州学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前有“二庄”（庄存与、庄培因），后有刘宋（刘逢禄、宋翔凤），“运之于虚而不能证之以实，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②。总

① 《刘师培全集》第三册第33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② 《刘师培全集》第三册第34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之,各派之间,各有得失。问题是他们的末流,或学有馀而思不足,或思有馀而学不足,甚至把学术作为敲门砖,志在仕途,更不足论。

整体上说,刘师培更推崇清代前期的汉学家,自然也就偏于古文经学。他早年交往的学界名流,也多与古文经学有密切关系。但他也不排斥今文经学,甚至还与他们多有来往。譬如他追随端方到四川之后,曾与著名学者廖平交往颇密,两人都很推崇洪适的《隶释》、《隶续》,认为可为研读经史之助。在治学方面,他们都不拘一隅,求新求变。廖平兼通古今,一生六变。《经学初程》说自己治学先由训诂入手,始觉唐宋人文“宽泛无实,不如训诂书字字有意”^①。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刘师培对于明代以来古文家所推崇的唐宋派也颇多微辞。所不同者,廖平《知圣录》对于纪晓岚、阮元等评价不高,而刘师培对于乡贤阮元则推崇备至。毕竟,刘师培与廖平,还是有着较大的差异。可以这样说,刘师培的学术研究,确实很难用传统意义上的今古文经学,或者汉学、宋学所能规范,因为他的研究已经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

三

说到刘师培研究的现代色彩,就不能不提到他的文学研究;刘师培的文学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

刘师培生活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世纪之交,内忧外患,促使那一代知识分子最早睁开眼看世界。他们从中西哲学思想的比较中,从华夏文明盛衰际遇的嬗变中,反思家庭文化与西方探险精神的矛盾,探寻科技思想和义利观念的冲突,衡量创新意识与社会体制革新的关系,评估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本质特性与发展方向。这是刘师培那一代人关注伦理学、关注教育学,尤

^① 廖宗泽《六译先生年谱》第5页,骆凤文校著,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其关注文学的精神动力所在。在刘师培看来,移风易俗,改造人心,文学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大之可以振尚武之风,小之可以为养生之助,而征引往迹,杂陈古事,则又抒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为劝戒人民之一助”^①。

中国文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处在一种融合变化之中。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是华夏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两汉以降,随着封建帝国统治的强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中西文化的融通成为一时潮流。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思想,也遵循着这种演变规律,在融合中获得发展,在发展中增强融合。刘师培《论文杂记》开篇第一则论中国文章之学,就与印度佛书作比较。他认为,印度佛书分为三类:一是经,二是论,三是律。而中国古代书籍,亦大抵可以分成三类:一是文言,藻绘成文,便于记诵,如《周易》卦辞爻辞之类,近似于佛书的经类;二是语,或记事之文,或论难之文,多用散体,如《春秋》、《论语》等书,犹如佛书的论类;三是例,语简事赅,便于遵行,如《周礼》、《仪礼》、《礼记》等书,好像是佛书的律类^②。由此笔锋一转,作者又将视野转到欧洲,第二则征引英国哲学家的论断,推论语言进化演变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一般规律。《文章原始》也说:“昔罗马文学之兴也,韵文完备,乃有散文;史诗既工,乃生戏曲。而中土文学之秩序,适与相符,乃事物进化之公例,亦文体必经之阶级也。”^③在世界多种文明的比较中反观自己,中国文学的特性也就凸显出来。这大约是二十世纪初叶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普遍的观感。那个时候出版的中国史、文学史、哲学史著作,往往开宗明义,总要先从中西比较中确定自己论述的价值,这几乎成为一种叙述模式。稍后的钱锺书《管锥编》也是如此。第一则论《周易》之“易”,乃“一名而含三义”,作者旁征博引,比较汉语与西方语言修辞的差异,指出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管锥编》自始至终,都

① 《刘师培全集》第三册第44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② 《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③ 《刘师培全集》第三册第45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是在这种比较中展开论述。因此,刘师培的“文学”观念,显然不是他个人冥思苦想的独创,而是时代所赐。

基于这样一种文学观念,刘师培论文学起源,论文学功能,论文学发展,论文章各体,就与“五经”为本的传统文论形成较大的反差。譬如论各种文体,他认为很多出于巫祝之官。他熟练地运用传统训诂手段,逐一辨析“巫”与“祝”的原始意义,从而指出:“文章各体,多出于斯。又颂以成功告神明,铭以功烈扬先祖,亦与祠祀相联。是则韵语之文,虽匪一体,综其大要,恒由祀礼而生,欲考文章流别者,曷溯源于清庙之守乎?”^①《论文杂记》中,他还指出:“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谣谚二体,皆为韵语。‘谣’训‘徒歌’,歌者永言之谓也。‘谚’训‘传言’,言者直言之谓也。”^②也就是说,中国早期叙事文体无一不是和神圣信仰、祭祀仪式、权力话语相关联。

由此延申,他认为中国的各体文章,也多用于各种祭祀的场合。《周末学术史序·文章学史序》这样写道:

吾观成周之制,宗伯掌邦礼,于宗庙鬼神之典,叙述尤详。而礼官协辅宗伯者,于祭祀之典,咸有专司,如巫史祝卜是也。试观周礼太祝掌六祈以司鬼神,即后世祭文之祖也。殷史辛甲作虞箴以箴王缺,即后世官箴之祖也。又太祝所掌六祠,命居其次,谏殿其终也者,后世哀册之祖也。谏也者后世行状谏文之祖也。颂列六义之一,以成功告于神明,屈平《九歌》其遗制也。铭为勒器之词,以称扬先祖功烈,汉魏墓铭其变体也。且古重卜筮,咸有繇词,遂启《易林》、《太玄》之体。古重盟诅,咸有誓诰,遂开绝秦诅楚之先。况古代祖宗之官,能辨姓氏之源,以率遵旧

① 《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载《刘师培全集》第三册第8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

② 《中国中古文学史·论文杂记》第11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